

近代冀中鄭州镇市场嬗变之因探析

卢忠民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社科部,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 要:鄭州镇曾是冀中乃至华北商业名镇,然而到近代却逐渐走向衰落。近代鄭州镇市场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根本原因是近代各级政府对鄭州大庙、庙会的扶植不力,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市场变迁的显著特点。而近代鄭州镇交通落伍、自然灾害频繁而防治救灾不力、自身经济发展滞后与周边集镇的勃兴及近代多战乱等也是其趋于衰落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当下对如何使诸如鄭州一类历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覆辙,快速走出萎靡不振的怪圈,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近代;鄭州镇;市场;衰落;原因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57-03

鄭州镇,位于冀中平原中部,在河北任丘县城北40里,靠平大(北平至河北大名)公路,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当间。往西6里是白洋淀,往北12里是大清河。近代鄭州镇有三种市场,一种是店铺和商号,它们天天营业;另一种是定期集市;还有一种是庙会。该镇在近代以前当属中等商业城镇,然而近代以后趋于衰落,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沦为农村集市,时至今日衰貌依旧。该镇市场之特点是随庙会之立而兴,亦随庙会之停而衰。庙会是决定鄭州镇市场兴衰的支柱,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市集镇市场的显著特点之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促其变迁的原因有哪些?在当前冀中加快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探索冀中乃至华北近代集镇市场的盛衰之因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如何使诸如鄭州之类历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覆辙,快速走出萎靡不振的怪圈,并从历史上找到发展动力与灵感,不失时机地利用其自身特色与优势实现振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促使该镇市场趋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须从诸多历史因素形成的合力中去寻求。

一、近代各级政府对鄭州大庙、庙会摧残破坏

自古而今,市场之兴衰与政府政策的关系甚密,即国家一旦采取宽松之策,市场贸易便会在一定限度内得到发展,反之则否。明、前清两朝历代皇帝、国家及地方政府大多鼓励扶植庙会,这是鄭州庙会得以勃兴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前提,这首先从是否愿投资修缮药王庙方面见一斑。如明万历神宗“大出内帑,重加修葺。又增建神衣、轩轅三皇之殿。以古今名医配食。”^[1]鄭州庙三大殿竣工后,万历帝又钦立鄭州庙会,并

敕令全国各地较大商号都来鄭州赶会^[2],“自是药王之会,弥加辐辏”^[3]。鄭州庙会遂声名远播,影响全国。康熙、乾隆二帝也大力扶植鄭州庙会,如因香火过盛,大庙几度焚毁,又几度重修^[4]。由于皇帝及地方政府出资修缮,方使鄭州药王庙“人烟辐辏,遭回禄而庙貌屡新”^[5]。因此,鄭州庙会于清康熙时期最为兴盛,庙会期间“诸货鳞集,祈福报赛者接踵摩肩”^[6]。可见,皇帝与地方政府的扶持是保证鄭州大庙完整、庙会盛昌的重要条件。

与康熙、乾隆二帝不同,道光帝下令取消鄭州庙会,后虽又恢复,但元气已伤,再也未恢复到以前盛况。民国政府也大肆摧残药王庙及庙会,清末民初政府倡导破除迷信,时任丘县长邵洪基规定“拆毁庙宇、拉倒神像”,于是鄭州庙十大名医塑像被全部拉倒,在百姓请求下,只把扁鹊塑像保留下来^[7]。前后政策的巨变,使鄭州庙会大受影响而衰落。由于庙会是鄭州市场的主要依托,所以庙会的衰落也就直接影响到鄭州市场的衰落。

有学者认为,近代华北集市除少数工矿铁路沿线地区有些兴起外,大都走向衰败,“其原因不外天灾与清朝统治的抑制、农业结构的变化、近代工矿与交通的兴起,而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是根本原因。”^[8]然近代鄭州镇市场衰落的根本原因却是晚清、民国政府对鄭州大庙、庙会政策的骤然变化。

二、近代鄭州镇交通落伍

交通对集镇市场的兴衰至关重要。靠近交通方便的公路、铁路或海、河、湖边的集镇,较易于输入生产生活商品,也易于输出农、副产品,方便远近农民交易,镇、集因之而兴,反之则衰。明清时期,鄭州镇水路交通极为便利,为其经济及市

收稿日期:2012-01-04

基金项目:2011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11LS018)

作者简介:卢忠民(1973-),男,河北东光人,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场的繁兴奠定了基础。那时的郑州“正当白洋淀下口……远通冀西各地,下有赵王河可直通天津……由南大桥到东大桥旧赵王河沿岸……船泊如林”^[7]。然而,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赵王河改道,已不再经过郑州^[8]。也就是说,1900年之后,郑州商民只能到八九里之外的十方院乘船再去津保等地,而在这之前,在郑州当地的赵王河沿岸就能解决之。明清时期,郑州陆路交通运输也极为便利。因为规模壮观的京德古御路正好经过郑州城,即郑州处于南七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进京的要道上,这里商旅行人甚多,并且声名显赫的郑州庙也设于此御路旁,郑州遂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物资集散地,集镇市场甚盛。然而,道光二十六年(1846)各地奉文裁撤御路沿线行宫^[9],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取消驿站,京德古御路遂渐衰败^[2]。民国以来,京德古御路被京大路取代,^①但由于军阀混战不断,路政荒废,因而此路长期处于破烂不堪、坑洼不平的大车道状态^[9]。郑州陆路交通的不畅,遂使商旅往来锐减,市场贸易遭受巨大影响。王兴亚通过对华北五市的研究认为,“镇市的发展及其趋势归根结底是受商品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制约”^[10],但这并不是郑州镇市场趋衰的根本原因。

三、近代郑州及其腹地自然灾害频仍而防治救灾不力

白洋淀及大清河、潞龙河流域是近代冀中自然灾害频仍的地带,而这些地区又多为郑州镇市场之腹地,因此自然灾害对郑州镇及其腹地的影响巨大,尤其是水灾,而郑州受灾尤重。郑州西靠白洋淀,地势低洼,宜涝宜旱。从地质结构上看,此地属“郑州向斜,亦称任西洼槽……主要有长洋淀、郑州北两个低点”^[2],因此,临近郑州的千里堤常溃堤决口,洪灾严重,“一遇河涨漫则顿成泽国”^[11]。近代任丘的自然灾害情况(见下表)。

近代任丘自然灾害统计表^[2]

	旱灾	涝灾	风灾	雹灾	虫灾	合计
前清	3	23	0	0	2	28
晚清	0	3	1	0	1	5
民国	2	7	0	1	4	14
合计	5	33	1	1	7	47

从上表可知,近代任丘共发生大的自然灾害19次,其中晚清5次,民国14次。灾害最重者当属涝灾,晚清3次,民国7次,共10次,占自然灾害总数的52.6%。由于郑州位于全县地势低洼处,所以每年任丘县有涝灾时,郑州多受其害。涝灾多为夏涝(7月中旬至9月下旬)、秋涝(8月中旬至9月下旬),以夏涝出现次数最多,秋涝造成损失较大。如光绪十六年(1890)7月,大清河、白洋淀千里堤先后决口,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有^[2]。郑州北接大清河,西靠白洋淀千里堤,如此大水,郑州人民应受灾最重。又如光绪十八年(1892)六月,“潞龙河决口,大水直泻郑州一带,该地居民为放水与下游民工发生械斗,河间知府王守堃亲自妥善处理了这场纠纷。

郑州一带48村居民为此立碑。”^[2]这说明郑州不但受灾频繁而严重,而且因水灾使得当地民众间关系复杂,纠纷多,严重时还得惊动官府。在此情形下,不仅商店、民房、牲畜、庄稼随水东流,就连民众的生命皆难保朝夕,有些商户或居民甚至因此而背井离乡去逃荒,这直接加重了近代任丘及郑州人民的灾难和穷困,购买力严重下降,对郑州集市贸易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

四、近代郑州自身经济发展滞后及周边商业集镇勃兴

清末到民国前期是华北集市的一个重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华北地区集镇的勃兴时期,集市与集镇同步发展^[12]。然而在近代任丘县整体集贸环境落后的情况下,郑州周围工商集镇的兴起,不但未使郑州镇市场盛旺发达,反而却严重威胁着该镇市场的发展。

有学者统计,乾隆时期冀鲁豫三省28府12州境内称“镇”者共有359处,《大清一统志》明文确认各镇商况繁荣者,三省合计不过有33处,约占总镇数的9.1%^[13]。然该文献中明文提到郑州“民居繁盛,商贾辐辏”^[14],这说明当时该镇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商业也非常兴盛。然从氏摘选近代冀鲁豫中心市镇50镇,其中河北有辛集、胜芳、白沟、郑州等16镇,辛集是“直隶第一镇”、白沟为“文明城市”,他虽仍把郑州镇列入冀鲁豫50大镇之一,但此时该镇只是“境内大镇”而已^[15],无其他别号,这从一个侧面可推知它已被周边集镇赶上并超过。

事实确实如此。此时,郑州周边一些集镇各自充分利用当地某种手工业的资源优势或技术优势而迅速发展,如宝坻县新集镇、香河县渠口镇等,就是因为有织布业作为主要经济支柱而发达的,并先后发展成为棉布等项产品的重要出产地而驰名远近。再如任丘县青塔镇、蠡县莘桥镇、清苑县大庄镇,早在19世纪末,就因布线交易发达而闻名。在青塔镇,每一集期集合于此地出售棉纱的平均约有200人,而出售布匹的平均约有400人,每集所售布匹数量在1000~1200余匹^[16]。显然,20世纪20年代郑州在织布方面已远落于青塔之后。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青塔集期恰与郑州重合,皆是农历逢二、五、八,这就无形中严重地冲击着郑州作为全县商贸中心的地位,起码在织布业方面。此种例子举不胜举,他如白沟、高阳、祁州等镇皆于近代崛起,吸引各镇附近商民就近贸易而不必再绕远去郑州,除非特别贵重上档次的商品,郑州镇的商业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彼兴而此衰,这也是郑州镇市场趋衰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影响乡村集市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16],此结论虽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并不适用于郑州。

五、近代郑州及其腹地战乱频繁

李正华通过对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的研究认为,制约乡村集市发展的直接因素有三个:农民必须有交换的需要与可能、都市经济的影响、自然条件(人口密度、地理

①京大路:北京至河北大名公路,1928年至建国前称平大路,此路北段,前身就是京德古御路。

位置、物产、交通等)^[14],缺憾的是未把影响集市盛衰的重要因素——战乱考虑进去。

近代以前的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康熙时期,国内虽也有战乱,但发生在任丘当地的极少,当时任丘“号称繁剧,其民物之殷庶、水土之沃衍、人文之茂美、政务之纷曠,甲于吾郡”^[2],总体尚称和平稳定,经济繁荣,所以郑州庙会发展迅速,致使康熙时期达鼎盛。然近代任丘灾祸频频,内外交织。如北洋军阀时期,战祸波及任丘,如两次直奉战争、国奉战争期间,天津、沧州、保定之间的冀中任丘、大城、霸州、胜芳、固安等地战祸连绵^[17]。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任丘县土匪、地痞、流氓横行,社会秩序混乱,集贸市场正常发展的安定环境不断遭到破坏。如1934年9月郑州西关逸匪王迁锦,伙同栗满常、朱元二人,持手枪、尖刀抢劫郑州城西村刘占元家财物,并将刘占元打死^[18]。抗日战争时期,郑州镇更遭罹难。郑州在七七事变前几年有座商147家(不包括小手工业),均属批发性质,事变后,郑州只剩下一些小工商业,集市贸易几成瘫痪^[19]。祸乱不仅直接冲击集市,使之不能正常进行,更甚者是使远近商民人心惶惶,既不

能安心生产,亦不敢外出买卖,从而更严重地影响着各地经济及市场的发展。尽管某些祸乱有时并未在郑州发生,但任丘及周边区县大环境的败坏,也会对郑州镇市场的正常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有人认为,“经过十二年战火的洗劫,全国集市一片萧条冷落,几至消失”^[20],此说并不过分。

综上,郑州镇作为近代中国北方衰落集镇的一个典型,其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该镇市场趋衰的根本原因是近代各级政府对郑州大庙、庙会的扶植不力,甚至疯狂破坏,这是该镇异于冀中其他县区市场变迁的显著特点。而近代郑州镇交通落伍、自然灾害频仍而防治救灾不力、自身经济发展滞后与周边集镇的勃兴及近代多战乱等也是其变迁的重要因素,这也许是冀中及全国许多集镇市场变迁的重要原因。在当前冀中加快小城镇及新农村建设的起步阶段,研究该镇市场变迁之因,对如何使诸如郑州之类历史名镇不致重蹈历史覆辙,快速走出萎靡不振的怪圈,并从历史上找到发展动力与灵感,不失时机地利用其自身特色与优势实现振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G]//外郡·郑州.北京:中华书局,1959:616.
- [2] 孙杰.任丘市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26-763.
- [3] 王英才,等.郑州述古[G]//任丘文史资料:第1辑,2002:60.
- [4] 光绪.重修药王庙碑记[Z],任丘市马合意藏.
- [5] 乾隆.建置志·坛壝[G]//任丘县志: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
- [6] 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J].山西大学学报,1993,(4).
- [7] 李增琦.郑州镇商业市场的变迁[G]//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246-247.
- [8] 民国.任丘乡土地理:河流一[Z],刘崑源手抄本,任丘市马合意藏.
- [9] 沧州地区交通局史志编纂委员会.沧州地区公路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290-291.
- [10] 王兴亚.对明清时期北方五省商业镇市之研究[J].许昌师专学报,2000,(1).
- [11] 民国.任丘乡土地理:土脉二[Z],刘崑源手抄本.
- [12]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J].近代史研究,2001,(1).
- [13] 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20-214.
- [14] 光绪.河间府二[G]//大清一统志:卷36.
- [15] 厉风.五十年来商业资本在河北乡村棉织手工业中之发展进程[J].中国农村,1934,(3).
- [16] 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2.
- [17] 严兰舫,主编,朱文通,王小梅,著.河北通史:民国上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39-50.
- [18] 北京市档案馆.任丘县政府关于密缉匪首王迁锦一案的公函(档号J181-31-1351)[Z],1934-09-04.
- [19] 任丘县城镇半年来工商业变化情况总结(任丘市档案馆:1-1-40)[Z],1949-08-27.
- [20] 钟兴永.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230.

[责任编辑 安世友]